

研究方法叢書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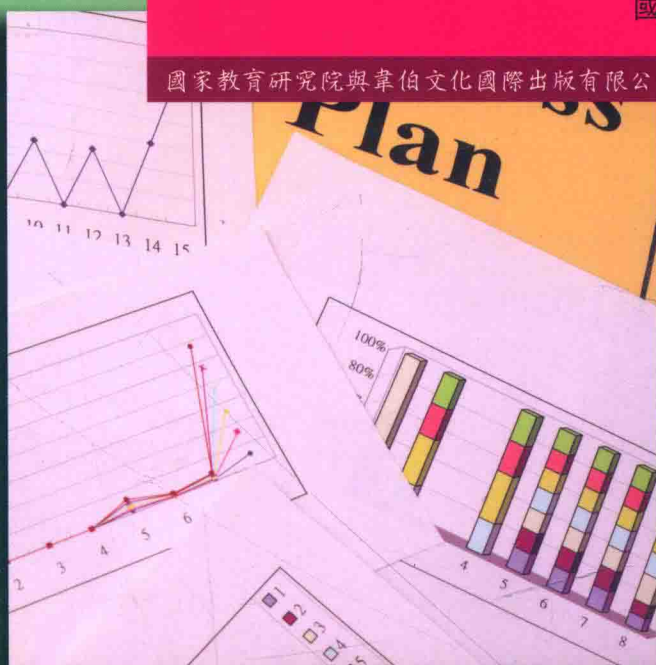
社會研究方法 指南 (下冊)

Pertti Alasuutari, Leonard Bickman and Julia Brannen ◆ 主編

葉宗顯、丘忠融、劉忠博、洪娛琳 ◆ 譯

國家教育研究院 ◆ 主譯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研究方法叢書⑮

社會研究方法指南

(下冊：ch19-36)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主編：Pertti Alasuutari

Leonard Bickman

Julia Brannen

譯者：葉宗顯、丘忠融

劉忠博、洪娛琳

主譯：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2013 年 12 月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社會研究方法指南(下冊) / Pertti Alasuutari, Leonard Bickman,
Julia Brannen 主編 ; 葉宗顯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2013.12
冊 ; 公分. -- (研究方法叢書 ; SR01-015-1)
譯自 :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ISBN 978-986-6338-73-1 (平裝)
1.社會學 2.研究方法
540.1 102020564

書名：社會研究方法指南(下冊)

主譯：國家教育研究院

(地址：23703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 2 號；網址：<http://www.naer.edu.tw>)

電話：02-86711111

作者：Pertti Alasuutari, Leonard Bickman and Julia Brannen

譯者：葉宗顯、丘忠融、劉忠博、洪嫻琳

責任編輯：林皓貞、馮苡桐、曹臻

出版者：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營業事業登記證字號：13118544

住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 285 號 6 樓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初版一刷：2013 年 12 月

(本書除紙本外，並無其他類型版本流通)

定價：500 元

展售處：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電話：(02)2518-0207 (代表號)

臺中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臺中市區中山路 6 號

電話：(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GPN：1010203120

ISBN：987-986-6338-73-1

*著作財產權人：國家教育研究院。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
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Tel: 02-3322-5558)

目錄(下冊)

第十九章	質性訪談與女性主義研究.....	505
第二十章	傳記研究法.....	531
第二十一章	焦點團體.....	553

第四部分 分析類型與證據詮釋

第二十二章	改變的多層次模型概論.....	587
第二十三章	社會研究資料的潛在變項模型.....	617
第二十四章	等化組.....	647
第二十五章	論述分析與對話分析.....	675
第二十六章	分析敘事與說故事.....	705
第二十七章	重建紮根理論.....	731
第二十八章	文獻與行動.....	761
第二十九章	錄影與工作和互動的分析.....	783
第三十章	質性資料的二手資料分析.....	803
第三十一章	量化資料來源的二手資料分析.....	825
第三十二章	執行統合分析.....	851
第三十三章	協同與綜合：整合質性與量化資料.....	883
第三十四章	整合質性資料的分析.....	909
第三十五章	量化分析中不同類型資料的整合.....	931
第三十六章	書寫與發表社會科學研究.....	959
索引.....		985

第十九章

質性訪談與女性主義研究

Andrea Doucet and Natasha Mauthner

壹、緒言

328

過去三十年來，女性主義與方法論和知識論領域之間已經產生了許多的交會。雖然女性主義學者一開始皆宣稱「女性主義方法」、「女性主義方法論」、以及「女性主義知識論」有其獨特性，但是自一九九〇年代起，她們也開始描繪出女性主義對於這些領域的重大貢獻，而不是去區分這些研究領域(參見 Doucet and Mauthner, 2006)。儘管如此，女性主義研究者在她們的研究工作上，仍然具有特殊的特質。第一，她們長久以來都一直在提倡女性主義研究不應只是針對女性進行研究，更要為了女性進行研究(DeVault, 1990, 1996; Edwards, 1990; Fonow and Cook, 1991, 2005; Ramazanoglu and Holland, 2002; Reinharz, 1992; Smith, 1987, 1989, 1999; Stanley and Wise, 1982, 1993)。第二，她們一直都在提倡女性主義研究應該關注更廣泛的社會變遷與社會正義議題(Fonow and Cook, 1991, 2005)。例如，史凱格(Beverly Skeggs)主張女性主義研究之所以獨特，是因為它「源於西方社會中現實的本質乃是不平等且具有階層性的這個前提」(Skeggs, 1997, 77)，而羅曼贊諾格魯與霍蘭德(Ramazanoglu and Holland, 2002, 2-3)則指出，這類研究是「蘊含著特定的理論、政治以及倫理之關注，這些關注使得不同的社會研究取徑有其獨特之處」。第三，女性主義研究者已經透過挑戰傳統或主流的資料蒐集、分析以及呈現的方式，積極地參與了方法論的創新(Code,

1995; Gelsthorpe, 1990; Lather, 2001; Lather and Smithies, 1997; Mol, 2002; Naples, 2003; Richardson, 1988, 1997)。

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許多女性主義者曾質疑實證主義的架構和量化方法，是否能夠適當地捕捉到女性的經驗以及日常生活(Graham, 1983; Oakley, 1974; Reinharz, 1979; Stanley and Wise, 1990)。早期女性主義辯論傾向在質性和量化的取徑之間畫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而這種區分所帶有的涵義為：質性方法在本質上就是女性主義的方法(Maynard and Purvis, 1994)。尤其深度的面對面訪談更被視為是「『女性主義方法』的典範」(Kelly et al., 1994, 34)。這種將女性主義研究和質性方法畫上等號的作法在初期就受到一些女性主義者的批判(例如 Jayaratne, 1983)，從那時起，女性主義就逐漸遠離獨厚特定的方法論取徑和方法。研究者已經認知到研究的方法論和方法應該要反映出正在研究的特定問題，以及女性主義的主要關注可以採取許多不同的取徑和方法來有用地加以處理(Brannen, 1992; Chafetz, 2004a, 2004b; Kelly et al., 1994; Maynard, 1994; McCall, 2005; Oakley, 1998; Westmarland, 2001)。

在承認當前女性主義研究的特徵之一是使用多種且混合的方法與取徑的前提下，本章將特別聚焦於女性主義學者尋求轉變傳統社會科學訪談以使其符合女性主義目標的方式。正如同女性主義對於方法、方法論以及知識論等議題的思考，已經對於較一般性的研究實踐和理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女性主義學者所帶給訪談的貢獻也對於形塑更廣泛之質性訪談的實踐與理論造成了影響，其中訪談是做為從女性生活來進行認識和對於女性生活進行認識的場域。

因此，本章目標是要檢視女性主義做為一種資料蒐集方式之訪談的辯論。一開始，我們會先勾勒出在女性主義訪談取徑中，我們所認為幾股重要的歷史趨勢，其中會特別討論奧克莉(Ann Oakley, 1981)那篇現在已經成為關於非階層性訪談實踐之重要性的經典文章。儘管奧克莉的貢獻一開始刺激了有關在訪談中創造親善和友誼之可能性與限制的討論，但近來有更多來自黑人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後結構和後殖民寫作的挑戰，質疑「他者」(others)可以透過訪談，或甚至是透過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被認識的程度到底有多少(Wilkinson and Kitzinger, 1996)。本章也會探討下述這個日益成為主要且重要的問題，即一個人

要如何能夠認識其他不同於我們的人(例如在跨文化的訪談中以及在女性訪談男性的情況中)，並且會突顯出女性主義學術界對於當代理解研究訪談最新的貢獻。

貳、女性主義對訪談的貢獻： 一九七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

在一九七〇年代，女性主義研究者開始接觸女性主義和方法論之間的交會，並且將她們的注意力轉到現有用來研究和理解女性生活的方法所具有的瑕疵。如同史密斯(Dorothy Smith 1974, 2)所指出的，在社會學中，「介於女性從她們所處位置出發(雖然並不一定也結束於這個位置上)來探索與體驗這個世界，以及現有能夠用來思考這個世界的概念和理論方案之間，存在著一個斷裂」。因此，早期女性主義社會學理論便指出了在理論上以及在方法論上，女性被排除的情況是何等地有重大影響。在將她們的眼光轉到用來生產出理論的主流方法上之後，許多女性主義學者開始對於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的量化資料蒐集方法表達出不安，更具體而言就是，她們對那些對於在行為的、生物的以及生物行為的科學研究中，有關性別差異之資料蒐集和詮釋中所存在的性別偏見感到不安。女性主義科學家記載到，尤其在實驗性和臨床的生物醫學研究中都只使用男性主體、只選擇男性活動與伴隨而來的以雄性為主之動物群體來做研究，以及研究準則中對於女性的赤裸裸忽略等(Haraway, 1988, 1991; Keller, 1983, 1985; Keller and Longino, 1998; Longino and Doell, 1983; Rose, 1994)。

雖然女性主義科學家是根據針對老鼠和狒狒所進行的實驗，做出了 330 了上述的觀察，但是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中，針對以人類來進行研究的過程和準則，也出現了類似的關注。女性主義社會科學家注意到了陽剛偏見是如何地充斥於研究之中，也許最能夠顯露這種偏見的就是對於理性、合理性、自主性以及斷裂性(disconnection)等傳統陽剛特徵的歌頌和吸納(參見 Code, 1981; Gilligan, 1977, 1982; Keller, 1985; Lloyd, 1983; Miller, 1976; Smith, 1974)。另外，在社會科學和人文

領域中，女性主義者也對於做為一種哲學架構的實證主義，以及它那將研究主體予以客觀化的不帶情感和「客觀的」科學取徑，展開了長久和廣泛的知識論批判。

在這個知識論批判中，女性主義者提出了三個特殊的關注。第一，女性生活和由女性所主宰的生活領域大多不見容於多數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因此，當史密斯主張說「社會學……一直是以男性的社會世界為基礎而建立起來」時(Smith, 1974, 7)，這就是一個家務事與孩童照料等女性所主宰的社會場域、有病的人以及年長者等都未被探究和被忽視的「社會世界」(另請參見 Finch and Groves, 1983; Graham, 1983, 1991)。第二，有某些特定的女性團體是更深刻感受到這些情緒，特別是那些有色人種的婦女，因為她們看到雖然在學術界裡有女性運動和女性主義的開展，但卻都沒有對她們發言或論及她們。在美國，這種感受被惡名昭彰的康比河集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名為〈一個黑人女性主義的陳述〉的宣言，適切地形容成是其中一種「瘋狂的感覺」(feelings of craziness)(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77/1986; 另請參見 Collins, 1990; Hooks, 1989, 1990; Lorde, 1984)。而在英國，非洲裔和亞洲裔的婦女則道出了在公共的、政治的以及學術對於女性生活的刻畫中，對於她們的忽略(另請參見 Bryan et al., 1985; Mirza, 1998; Wilkinson and Kitinger, 1996)。第三個關注是有關實證主義架構內，亦即量化調查，所偏好的研究工具，以及它能夠適切地捕捉到女性生活所具有之複雜性的程度。就像葛瑞罕(Hilary Graham)所感嘆的，婦女的經驗竟是由依據男性生活所設計出來的調查來進行測量的；她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所提出的下述這個挑釁問題，總結了對於用來瞭解女性經驗之調查的日益不滿：「她的答案會合於他的問題嗎？」(Graham, 1983)。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主義社會科學家開始將她們的注意力轉移到訪談的可能性和實踐。在一九八〇年代期間，女性主義研究者，特別是那些在社會學領域中進行研究的女性主義研究者，開始著手處理一個議題，即怎麼在堅守從事非階層性和平等的研究這一個受到廣泛承認女性主義目標的前提下進行訪談。此一批判起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奧克莉那篇現在經常受到引用有關討論女性訪員和受訪者之間「非階層性的」關係的文章(Oakley, 1981)。她的討論是要尋求提供一個

不同於在社會學教科書中被呈現為「適當訪談」的替代方案。講得更廣泛一點就是，奧克莉挑戰了強調「客觀性」、保持距離以及不受研究者價值或偏見所污染之「乾淨的」(hygienic)研究等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相對於一個客觀的、標準化的以及不帶任何情感的訪談取徑，奧克莉主張「當訪員和受訪者之間的關係是非階層性的，以及當訪員已經準備好在此一關係中投入她或他的個人認同時，透過訪談來得到有關人類事物的研究結果此一目標，才可以獲得最佳的實現」(Oakley 1981, 41)。在此數年後寫作的范奇(Janet Finch, 1984)也呼應了奧克莉的關注，她強調兩名婦女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一個訪談情境中達成親善關係，而其他人也對此表示贊同，並主張在訪談階段中發展互惠關係是具有重要性的(Mies, 1983; Rheinharz, 1992; Stanley and Wise, 1983, 1993)。

在一九八〇年代進行寫作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心中的一個主要懸念是，要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關係以及更廣義之權力關係，保有尖銳的敏感度(參見 Maynard and Purvis, 1994; Ramazanoglu and Holland, 331 2002)。然而，在一九九〇年代，女性主義社會科學家開始挑戰非階層性訪談這種概念，也就是挑戰認為存在於女性之間的權力差異可以被拉平的想法，以及女性之間的互惠性和相互性必然可以引領出「更佳的」認識的假設。的確，在認識和再現她們所訪談之主體的敘事、經驗或生活時，女性主義者開始展現出越來越能夠清楚體會到其間所牽涉到的「兩難困境」和緊張關係(例如 Ribbens and Edwards, 1998; Wilkinson and Kitzinger, 1996; Wolf, 1992)。

以西方思想為本的社會科學家對於是否能解決這些緊張關係表現出深切的「憂心」(Fine and Wiess, 1996, 251; 另請參見 DeVault, 1999)。然而，開始去認識「他者」時所會遭遇到的倫理困境早已由黑人女性主義學者(Lewis, 2000; Mama, 1995; Reynolds, 2002a)，以及身處於不平等關係特別尖銳之脈絡中的女性主義者，例如在低收入的社區和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女性主義者(Patai, 1991; Wolf, 1992)，清楚地闡述出來。一個對於此議題最直言不諱的學者是帕塔伊(Daphne Patai)，其堅稱由於社會經濟和全球的不平等，介於第一世界女性訪員和第三世界女性受訪者之間的研究關係不但在本質上就是階層性的，而且也可能是不合倫理的(Patai, 1991)。不僅如此，有關誰生產知識、以什麼政治觀點、

以及從哪一個位置出發等問題(Mohanty 1988, 1991)，也在女性主義的、後現代的、以及後殖民的研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和急迫。整個一九九〇年代，在西方脈絡中進行研究的有色人種婦女以及在第三世界背景中從事研究的女性主義者，已經突顯出存在於研究中的排除、種族主義以及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等的系統性過程。其中關鍵且受到許多辯論的議題包括：全球資本主義和女性主義跨國認同的交會(Ferguson, 2004; Schutte, 1993, 1998, 2000; Shohat, 2001)、在主流文化中的女性主義者能真切地認識次文化(subaltern cultures)的程度(Alexander and Mohanty, 1997; Ladson-Billings, 2000; Mohanty et al., 1991; Oyewumi, 2000; Spivak, 1993)、認識跨國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認同的挑戰(Bunch, 1987; Stone, 1991)、以及從屬的「他者」(subordinate others)在知識生產中的角色與再現(Bernal 2002; Christian 1996)。

在奧克莉讚揚非階層性的女性對女性訪談、以及此種訪談能夠產出對於認識婦女生活更大洞見之能力的十年之後，女性主義研究有了三百六十度的轉變，並開始凸顯出，嘗試假裝訪談對於研究者和受訪者都是友善的或相互有利的這種作法所具有的潛在危險。史黛西(Judith Stacey, 1991: 114)便主張：「比起實證主義的、抽象的以及『陽剛特質的』研究方法，民族誌方法會使主體遭受到更大的危險和剝削。而且親近關係越深厚(研究者／被研究者關係之明顯相互性越大)，危險也就越大」。寇特里(Pamela Cotterill, 1992: 597)同樣也將注意力置於「一個鼓勵發展友誼，以求能夠聚焦於人們相當隱密的和私人面向的生活之研究技術，其所具有的潛在傷害效果」。上述這些批評延續到了新千禧年，其中，女性主義者對於女性主義研究者也許再製了她們原本所要挑戰之實踐此一反諷，做出了以下的評論：

因此也許有點諷刺的是，學者們發現原本意欲用來達成女性主義目的——與參與者之間有更多的合作、更大的互動和更開放的溝通等——的方法論改革，可能反而在不經意間重新引入了女性主義研究者所希望消除的倫理困境：參與者所感到的失望、疏離、以及潛在的剝削(Kirsch, 2005: 2163)。

這三十年來針對訪談做為從女性出發，以及為了女性蒐集知識最合適(或甚至是最佳)方式的有用性所進行的熱烈反思，已經為有關「認識」他者之更廣泛的理論性和知識論辯論鋪下了道路。自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女性主義者已經將她們的注意力轉到由訪談陳述創造出知識時，會牽涉到的困難和挑戰。

332

參、女性主義對訪談的貢獻： 近年來的議題和關注(一九九〇年代到二〇〇〇年代)

雖然奧克莉所提出的議題已經受到批判，並且被其他的重要關注所取代，但她針對「什麼對於女性主義訪談而言才是重要」這個問題的反思，在這個新千禧年仍舊有人認為是高度相關的。換言之，非階層性的關係、權力、親善關係(rapport)和同感(empathy)等議題，以及在訪談過程中投入個人認同，仍持續地主宰了女性主義研究實踐的討論。然而，這些討論已經變得更為複雜且有了微妙變化，另外也吸收了一些其他的關注，包括訪談做為共同製造意義的場域(也就是「如何」進行訪談)、對於「什麼」構成資料的質問、以及訪談的理論預設和基礎，與更廣義而言的研究方法。

一、訪談中的非階層性關係

早期對於非階層性訪談之討論的基礎是一種假設，即女性間的差異可以被一舉撫平或消除。數十年來關於女性間差異的學術研究、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對於諸如「女性」這種概念和認同之穩定性的批判、以及黑人女性主義對此一辯論的貢獻，都揭露這種立場所內含的天真和本質主義。許多女性主義研究者已經指出在性別以外的結構特性，例如階級、族群性、年齡、性慾特質以及全球位置等都是很重要的，她們也指出權力不平等在訪談過程中的運作方式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唐寧(Tang)在她對於同儕(在中國和英國中身兼母親和學術人員兩種角色的婦女)的訪談中，就主張訪員和受訪者兩人對於社會

的、文化的、以及個人差異的感知會影響訪談中的權力關係，以及訪談雙方之間的關係動態也會影響到所揭露是怎樣的資訊(Tang 2002; 另請參見 Garg 2004)。其他人則聚焦在研究關係的其他面向會如何地影響訪談的內容和執行，其中包括：訪員和受訪者對於訪談所使用之語言的通曉程度(Garg 2004; Temple and Edwards 2002)、訪員和受訪者之間的世代差異(Casey 2003)、共享的種族立場(例如黑人女性研究者訪談黑人女性有關具有高度敏感性的議題)(Few et al. 2003)，以及在訪談中階級關係可能如何地影響女性同性戀故事的「訴說」(McDermott 2004)。

對於研究中之權力關係的討論，過去幾乎全都聚焦於訪談會如何影響被研究者。然而，近來女性主義者已經凸顯出研究的受訪者能夠運用權力的方式，進而創造出一種介於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雙向的權力流動關係。受到傅柯對於權力之理解的啟迪，塔帕比耶克與亨利(Thapar-Bjorket and Henry, 2004)將研究中的權力階層性視為是「浮動的、多重的和交錯的」(Thapar-Bjorket and Henry, 2004, 364)。借助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所身處的多重位置，她們主張自己做為「在一個非西方場景中非白人的／非西方的，以及非白人的／西方的研究者」的混合位置，讓她們得以「仔細地檢視在一個由各個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的多重潛在認同所構成的脈絡中，權力進出的運作」(Thapar-Bjorkert and Henry, 2004, 364)。她們特別指出了在訪談過程之中與之後，年齡、世代、國家的位置，以及互惠性會如何影響這些權力關係的展現。同樣地，借助她對於黑人母親的研究，雷諾斯(Reynolds, 2002b)也質疑起「有權力的研究者」(powerful researcher)概念。她指出「在這些母親和做為一個研究者的我之間的權力關係中，牽涉到了一個動態的、流動的以及雙向的互動過程」(Reynolds, 2002b, 303)。她發現在她訪談之內的權力關係，會隨著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種族、階級、年齡以及性別的結構差異，而有所轉變。她寫道：

「在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共享相同種族和性別立場的情況下，例如黑人女性研究者訪談黑人婦女，這兩個團體之間的權力主要會經由其他諸如社會階級和年齡差異等事實而有所調整。這種介於種族、階級以及性別之間的互動顯示出，社

會研究中的權力並不是一種固定且統一的建構物，由研究者施加於研究參與者身上。相反地……權力是多面向的、關係性的以及互動性的，並且會在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之間，隨著不同脈絡與她們的不同結構地位而持續轉變和重新調整」(Reynolds 2002b, 307-8)。

女性主義對於在訪談情境和關係中，無可避免地會有階層性和權力差異這種情形的反思，並非是在提議或暗示對於此一方法的棄絕，而是要邀請研究者藉由承認、辯論以及與這些權力差異共處，來對於她們自己的研究實踐進行反身性思考。

二、同感、親善關係以及互惠性

女性主義者已經深化了她們對於研究情境中同感、親善關係以及互惠性(reciprocity)等議題的反思，其中，近來的焦點是在於如何導航社會定位的差異。有關研究者應該在訪談中透露多少關於自己本身、自己的處境狀況以及自己的觀點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有人在探詢(參見 Edwards 1993)，特別是在研究顯然具有政治性且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可能有意見分歧之議題的時候。舉例而言，在她於英國的塞爾維亞裔社群中針對塞爾維亞人的暴行責任的研究中，普萊克(Pryke, 2004)挑戰了這個方法論常規，即在質性研究中訪員絕對不能不同意受訪者的意見。

有關訪談中親善關係與同感的議題，往往是和女性對女性的訪談一起討論和概念化的。然而，自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女性主義者就越來越常調查男性的生活，這因此引起了與男性研究主體之間發展親善關係和同感的問題。這些挑戰已經出現在例如針對有權力的、權威的以及穿著制服之男性(例如資深的警官)，或者針對暴力的男性犯罪者所進行訪談的女性主義研究者著作中(Campbell, 2003; Presser, 2004, 2005; Taylor and Rupp, 2005)。研究父職身分的研究者進一步探索了如何培養女性主義的研究與男性之間關係。例如在近來對於離婚父親的調查中，加拿大的女性主義者反思了在父親權利團體一直不斷取得發展動力的政治氛圍下，訪談父親時所會產生的緊張關係。她們凸顯出父

親的敘事如何可以聽成像是在潛在地傷害女性照料他人的傳統利益(參見 Doucet, 2004, 2006; Mandell, 2002)。針對男性經驗所進行的女性主義研究證明了, 在那些儘管有著最終可能會損害到更大的女性主義研究目標之巨大權力不平等和衝突的關係內, 如何還是可以在訪談背景中建立起值得信賴的關係。

三、在研究關係中投入個人認同

在奧克莉(Oakley, 1981)的早期作品中, 將個人認同投入到研究關係中的想法呈現在一種傾向上, 也就是傾向將研究者架構成對於研究和被研究主體而言要麼是一位「局內人」、要麼就是一位「局外人」的二元對立關係。奧克莉和許多追隨她的女性主義研究者透過下述這個論證來具體說明此一傾向, 即若是在研究者與她的被研究主體間具有一個共享認同的區域, 則不公平的、剝削的或不合倫理之研究出現的可能性就會減少。以奧克莉自己的情況來說, 共享的母職身分是研究者取得在研究中「局內人」地位的門檻。但其他的女性主義者卻很快地就對這種概念提出異議, 她們凸顯出不同的以及可共享的結構特徵可能會如何地阻礙相互性和互惠性(Coterill, 1992; Edwards, 1990, 1993; Glucksmann, 1994; Ramazanoglu, 1989; Reynolds, 2002b; Ribbens, 1989; Song and Parker, 1995)。女性主義學者也注意到, 即便在研究者和受訪者共享了性別、族群性、階級和年齡等結構和文化相似性的情況下, 也無法保證會有相互的瞭解或「更好的」認識。如同黎斯曼(Catherine Riessman)所指出的, 「僅僅是性別和個人投入也許尚不足以達到全然的『認識』」(Riessman, 1987, 189; 另請參見 Ribbens, 1998)。因此, 自從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開始, 女性主義對在訪談中投入認同的討論就拆穿了一個觀點, 亦即任何在個人社會定位性、結構位置以及自傳經驗上的共通性(commonality), 能夠保證這些共享的身分認同軸線將會確立一個開放或「更好的」研究交談(參見 Dyck, 1997)。

在此同時, 女性主義者開始認知到做為一位「局內人」的身分認同其實是充滿矛盾的, 她們也認知到在研究關係中, 在研究關係中同時做為局內人與局外人的程度是多變的(例如 Narayan, 1993; Olesen,

1998; Stanley, 1994; Zavella, 1993)。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便是順此思路而稱自己是一位「身處局內的局外人」(Hill Collins, 1990, 1998)，她以這種方式來描述自己是「身處於種族、性別和社會階級等權力關係交會」的「邊緣之上」(Hill Collins, 1999, 85；另請參見 Anzaldua, 1987; Braidotti, 1994)。此外，後結構主義針對主體性和認同的理論概念與經驗建構物的討論，也進一步加強了對於做為一位局內人或局外人之意義的問題化，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論上。

在這些辯論中有兩項關鍵議題浮上檯面。第一，目前在女性主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廣泛的共識，即「局外性」(outsiderness)與「局內性」(insiderness)並不是固定或靜止的位置；相反地，它們是持續浮動與具有滲透性的社會位置，而各個社群成員所經驗到的和表達出來的都不同(Naples, 2003, 373；另請參見 Naples, 1996)。對於「他者性」(otherness)所具有之複雜性的持續反思，已經凸顯出研究者在嘗試要去瞭解那些在認同與經驗的多重軸線上是不同於研究者本身的其他人時，所面臨之日益加重的挑戰(參見 Fawcett and Hearn, 2004)。

第二，在實際參與研究訪談之實踐時，所面臨的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也被視為是既非統一、亦非靜止不變的。舉例而言，瑞哈茲(Shlulamit Reinharz)在一本書內題為〈我是誰〉(Who Am I)的篇章中，反思了她在從事訪談和田野調查時如何擁有「將近二十個不同的自我」(Reinharz, 1997, 5)。近來女性主義對於此一辯論的貢獻，已經凸顯出訪談主題以及在訪談遭遇時所發生的關係動態，會如何影響我們呈現自己以及我們選擇去強調自己認同中的哪一部分。若干研究者在橫跨數種不同的認同的情況下，可能會採取「中道立場」(in-between positions) (Ghorashi, 2005)，而其他研究者則是強調「在社會建構主義的訪談期間所發生的劃界過程」，在其中「各種不同之預先假設的角色會被研究者和他們的受訪者創造出來」(Gubrium and Koro-Ljungberg, 2005, 690)。

四、訪談與對於「什麼」構成資料的質問

女性主義研究者也質問了從訪談資料中顯露出的到底是「什麼」。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女性主義研究者，特別是那些受到

女性主義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影響的研究者(Harding, 1987; Hartsock, 1983, 1985; Smith, 1987),有一種傾向會去談論和書寫有關看似融貫和透明(transparent)的主體,這些主體的經驗、內心的聲音或主體性是可以被良好陳述的研究問題所捕捉。回到葛瑞罕有關「她的答案」並無法符合「他的問題」的這個論點上,這裡存在著一個假設,即如果問題只要能夠被更好地重新陳述,那麼「她的答案」當然會提供瞭解女性經驗的坦途。然而,在後來的數年間,後現代和後結構的批判意味著女性主義者已經開始強烈地挑戰此一觀點。研究者已經將這個問題稱為在訪談和她們的研究中一再出現之「透明自我問題」以及「透明敘述問題」(Hollway and Jefferson, 2000, 3; 另請參見 Frith and Kitzinger, 1998, 304-307)。

討論後結構主義對於主體概念化的廣泛學術研究現在已經順利地整合進女性主義研究和女性主義的訪談取徑中。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後結構主義有關非統一、持續變動的主體的理論化,在這種主體中並不存在著任何的「核心自我」(例如 Weedon, 1987)。即便是對於後結構主義取徑頗有微詞的女性主義學者也都受到此一批判的影響。例如哈定(Sandra Harding)已經突破了原本她所抱持女性主義立場論的狹隘概念,進而主張「知識的主體是……多重的、異質的以及矛盾或不融貫的」(Harding, 1993, 65)。但是,其他學者則仍舊未被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所折服,並持續堅持某種融貫的主體概念,或堅持在她們訪談中以及在知識建構實踐中的仍存在「認識的主體」(knowing subject)(參見 Code, 1993; Smith, 1999; Stanley, 1994)。舉例而言,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主張就相當具有說服力,他指出,後結構主義「拒斥現代性的統一主體這種作法,只是複雜化了主體,讓它變成由多重和片斷的論述所構成的多種主體」(Smith, 1999, 108),同時,艾爾蔻芙(Linda Alcoff)也堅稱:「後結構主義的批判若非是關於建構所有的主體,就是關於沒有任何主體」(Alcoff, 1988, 409)。這些在訪談中受到評估之有關「誰」或「什麼」的辯論,在針對後結構主義與唯物論/詮釋主義的主體概念之更廣泛研究(參見 Benhabib, 1995; Butler, 1995; Fraser and Nicholson, 1988; Weeks, 1988)、在針對理論化有關「經驗」概念的辯論(Holt, 1994; Scott, 1992, 1994)、以及在女性主義對於傅柯各種不同主體

概念的批判(Deveaux, 1994; McNay, 1993; Sawicki, 1991)等背景中，一直都持續出現在女性主義研究的討論裡，並延續到了新千禧年。

五、做為共同合作製造意義的訪談：訪談中「如何」的問題

女性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受到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影響的女性主義者，強調訪談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做為一個蒐集資料的處所，也在於做為一個資料被共同建構、經由說故事鍛造出認同以及開始製造意義的場域。研究者已聚焦在研究訪談如何能對研究參與者具有特別強烈的意義(Hiller and DiLuzio, 2004；另請參見 Brannen, 1988)。研究訪談可以是個人「道德」認同的建構場域(Presser, 2004)，也可以在主題是具有敏感性質時，做為一個抵抗或療癒潛在場所(Taylor, 2002)。在普瑞塞(Lois Presser)對於曾經犯下「重大刑案」，包括對於女性犯罪(強暴女孩與婦女、以及攻擊與謀殺女性伴侶)之男性的質性研究中(Presser, 2005, 2067)，她檢視了訪談本身如何扮演一個男性敘事和認同創造的背景。在反思她做為一位在此一背景中的研究者角色後，她凸顯出她所訪談的男性如何在將他們自己呈現為「善良且具有男子氣概」以及「彬彬有禮」的同時，將她這位研究者建構成一位不僅「在有關與男性關係上需要力量和指引」，同時也是「一個宰制幻想之對象」的人(Presser, 2005, 2086)。因此，普瑞塞主張女性主義研究者需要更加關注訪談背景中的權力關係如何能夠變成一個人資料的其中一部分，同時，她也疾呼：「要緊密和深入(多層次)檢視訪談中的『如何』問題，而不只是探討『什麼』的問題而已」(Presser, 2005, 2087)。

336

這些議題也在越來越多討論焦點團體的文獻中受到廣泛的注目。焦點團體，或稱團體訪談，已經開始被視為破除介於訪員和受訪者間的階層關係、提供有關以團體為基礎之討論的焦點、以及允許一種商討概念和議題之互動性論壇出現等的重要方式(參見 Doucet 2006; Frith and Kitzinger 1998; Kitzinger 1994; Munday 2006; Warr 2005; Wilkinson 1999)。例如凱辛格(Kitzinger 1994, 119)就堅稱團體訪談的互動性質「使得研究者能夠去……探索敘述是如何透過社會互動而被建構、表達、責備、反對、以及改變的」。在對於拉丁裔青少年性別認同研究中，使